

# 中印泰戈尔研究之比较

尹锡南

**【内容提要】**迄今为止,印度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进行分析。与印度学界的泰戈尔研究一样,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是除了印度学界以外最为丰富的一派。中印两国的泰戈尔研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存在的差异更加明显。中印两国的泰戈尔研究在研究语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均存在很多差异。本文尝试对此异同现象作一简略探讨,并就如何提高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水平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泰戈尔;泰戈尔研究;印度文学;比较文学

**Abstract:** Research on Rabindranath Tagore in China and Indi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ough Tagore studies are to some extent as fruitful in China as they are in India, there are divergences her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might be due especially to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conceptual frameworks, language media, and forms of research. In order to enhance and promote Tagore studies in China, our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hould focus on language training, translation of his correspondence that remains unpublished in China, and greater exchanges with Tagore specialists in India.

**Key Words:** Research on Rabindranath Tagore, India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作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泰戈尔除了享有世界声誉并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研究外,还在印度国内得到了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初,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印度学者即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迄今为止,印度学者关于泰戈尔的研究著作不计其数。有的研究著作以英文出版,有的以孟加拉语、马拉提语或印地语等出版,还有的先以马拉提语或孟加拉语出版再译为英语在印度出版。有的印度学者干脆将自己的英文版泰戈尔研究著作在国外出版,直接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交流,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和一些著名的印度梵语诗学研究者在国外出版英文研究著作颇为相似。由于本土语言、宗教文化和资料来源等各方面优势,印度学者的泰戈尔研究整体上来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客观地看,在泰戈尔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和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泰戈尔与西方国家的文学关系研究,以及泰戈尔文学理论比较研究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学者和西方学者由于本土语言文化和资料优势,也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笔者在印度期间收集的英文资料为基础,尝试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印两国泰戈尔研究之异同进行抛砖引玉似的简介,以使中国学界得以管中窥豹。

## 一、印度的泰戈尔研究简况

迄今为止印度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初期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到 1947 年印度独立的三十多年，为泰戈尔研究的初级阶段，也是第一个时期；独立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左右为泰戈尔研究迅速繁荣和发展的阶段，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三十年左右，为泰戈尔研究不断深化和取得突破的第三阶段。目前，印度的泰戈尔研究仍然处在非常活跃的时期。下边以三个时段为序进行简介。

印度独立以前，印度学者关于泰戈尔研究的英文著作相对说来没有独立以后的著作丰富，但有的学者对泰戈尔的研究却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笔者已知最早出版的关于泰戈尔研究的书是沙斯特里 (K.S.R.Sastri) 于 1916 年出版的《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独立后成为印度总统的著名宗教哲学家 S. 拉达克里希南曾与泰戈尔谋面多次，并受益于后者的教诲。他于 1918 年在英国出版了著作《泰戈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1961 年此书在印度本土再版。他在书中对泰戈尔充满时代气息的哲学观进行解释：“他赠与我们的充满人性气息的神 (human God)。他不屑于谈论世界虚幻的概念，而是高度赞扬行动，给宗教灵魂带来勃勃生机。”<sup>①</sup>他还论及泰戈尔的哲学理念之于印度和世界的时代价值。在他看来，泰戈尔的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范畴，上升到更高的人类关怀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是给人类世界的一种福音。“他表达的印度声音不仅是说给印度人、也是让全人类倾听的。”<sup>②</sup>S. 森出版于 1929 年的著作对泰戈尔的东西文化观念、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说：“泰戈尔企盼东方与西方的合作，因为他信奉国际主义。他的国际主义意味着互相依赖。这是解决目前时代难题的办法。”<sup>③</sup>森看到了泰戈尔温和性格之外怒目金刚的一面，他认为：“泰戈尔是对英国统治印度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他甚至比很多激进派领袖更为极端，比那些缺乏想象力的批评家还要敏锐，比很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更要严厉。”<sup>④</sup>尼赫鲁在独立前夕的 1944 年写下了代表作《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他在书中对于泰戈尔有过一些评价。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他还认为，尽管泰戈尔具有国际主义意识，他却一直扎根于印度文化土壤，灵魂里浸透了古代奥义书的哲学智慧。尼赫鲁还把甘地与泰戈尔两位印度现代伟人进行比较。他认为，泰戈尔本质上代表着印度的一种文化传统。相形之下，甘地却更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人物，几乎是“印度农民的化身”，代表着印度另一种古老传统即“自制和禁欲主义的传统”。两人的相同点在于：“都具有世界眼光，而同时又都是十足的印度人。他们似乎是代表着印度的迥然不同而又彼此和谐的两方面，并且是彼此互补其不足的。”<sup>⑤</sup>尼赫鲁的观察和论述是有价值的。他以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眼光读出了泰戈尔思想的时代价值。克里巴拉尼在 1947 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1949 年该书再版。他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和评价了泰戈尔、甘地与尼赫鲁三位伟人。如第一章便是论述甘地与泰戈尔的思想异同。<sup>⑥</sup>这本视野宽广的书为克里巴拉尼日后出版泰戈尔传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著名英语作家 M.R. 安纳德也出版了纪念泰戈尔的书。

从第一阶段的泰戈尔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关注泰戈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东西文化理念，对于其文学作品的探讨尚处萌芽状态。

<sup>①</sup> S. Radhakrishnan,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Baroda: Good Companions Publishers, (1<sup>st</sup> edition, 1918), 2<sup>nd</sup> edition, 1961, p.3.

<sup>②</sup> Ibid., p.107..

<sup>③</sup> Sochin Se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Calcutta: Asher & Co., 1929, pp.30-31.

<sup>④</sup> Ibid., p.62.

<sup>⑤</sup>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社，1956年，第447页。

<sup>⑥</sup> K.R. Kripalani, *Gandhi, Tagore, and Nehru*, Bombay: Hind Kitabs Ltd. Publishers, 1949, pp.7-32.

当然，二十世纪初期，印度国内对泰戈尔的研究并非一味赞扬。相反，有的学者对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进行质疑。他在当时招来了很多的反对声音，例如，S.C.萨马基巴迪（Suresh Chandra Samajpati, 1870-1921）等指责泰戈尔缺乏道德意识。马克思主义者对泰戈尔也颇有微词。S.K. 代（Sushil Kumar De）和 N.C.桥杜里（Nirad C. Chaudhuri, 1897-1999）等人宣称，泰戈尔时代已经结束。泰戈尔的坚定支持者包括 M.C.森（Mohit Chandra Sen, 1870-1906）、P.森（Priyanath Sen, 1854-1916）等人。关于泰戈尔文论的争鸣构成了泰戈尔时期孟加拉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也好，支持也好，人们都无法摆脱泰戈尔文论思想的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现代孟加拉文学批评为泰戈尔创造的文论传统所左右。”<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A.C.波斯出版了比较文学性质的著作（A.C. Bose, *Three Mystic Poets: Yeats, A.E. and Tagore*, 1945），对泰戈尔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泰戈尔研究的新模式。这一新模式将在独立以后的泰戈尔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某些在印度与泰戈尔相处甚久的西方学者也以著作形式加入到泰戈尔研究行列中来。E.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于 1921 和 1926 年先后在印度出版关于泰戈尔的两部著作。汤普森的研究也成为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泰戈尔的学术前奏。

印度独立以后，也许是印巴分治带给人们太多的心灵创伤，以及百废待兴的现实局面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学者们的精力，整个五十年代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不多。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凭借独立前的学术积累，出版了厚重的泰戈尔研究著作。例如，S.C.S.古普塔的著作以甘地对泰戈尔的称呼“伟大的哨兵”（The Great Sentinel）为题，对泰戈尔的思想观念以及歌曲、戏剧和小说等艺术体裁进行分析，表现出良好的学术品格。例如，他在论述泰戈尔的思想特征时，不无道理地认为：“如果泰戈尔支持和鼓吹的观点可以一个词来总结的话，那就是团结，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追求韵律、和谐与完美的诗人和先知。”<sup>②</sup> B.G.雷（Benoy Gopal Ray）于 1949 年出版的著作探讨泰戈尔的哲学思想。他先考察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来源，再就他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最后再试图确定泰戈尔哲学在当代印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他的结论是：“历史将永远记住泰戈尔，因为他是一位充满人性的、也为人类服务的哲学家……没有哪位哲学家达到过他的辉煌高度。他教导我们的是一种人的宗教、人道主义的宗教。其次，他教导人类怎样通过爱获得解脱。”<sup>③</sup>雷的著作显示，独立后的印度学者仍然坚持 S.拉达克里希南的探索路线，对泰戈尔进行哲学观察。雷在论述时引用了拉达克里希南和汤普森关于泰戈尔的研究著作，显示了学术继承和超越。

五十年代对泰戈尔研究的平淡局面在六十年代被打破。1961 年是泰戈尔一百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印度文化巨人和民族英雄，印度学界相继出版了多种纪念文集。例如，1961 年，印度文学院出版的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便是典型例子。<sup>④</sup>这部厚达 500 多页的文集收录了东西方世界各国学者回忆或研究泰戈尔的文章，撰稿者包括安纳德、S.K.查特吉、U.乔西和 B.波斯等很多著名学者，也包括冰心、赛珍珠（Pearl Buck）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等东西方知名作家或学者。安纳德等印度学者对泰戈尔的美学观、艺术观、文学艺术创作及泰戈尔与东西方文化关系进行了阐述。由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出版的泰戈

<sup>①</sup> Nagendra, *Literary Criticism in India*, Nauchandi and Meerut: Sarita Prakashan, 1976, p.25.

<sup>②</sup> S.C. Sen Gupta, *The Great Sentinel: A Stud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Calcutta: A. Mukherjee & Co., Ltd., 1948, p.41.

<sup>③</sup> Benoy Gopal Ray,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Bombay: Hind Kitabs Ltd., 1949, p.147.

<sup>④</sup> S. Radhakrishnan & Humayun Kabir, eds., *Rabindranath Tagore: A Centenary Volume (1861-1941)*,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1.

尔纪念文集的论文全部由印度学者撰稿，论述的内容也包括了泰戈尔研究的很多方面。<sup>①</sup>此外，印度各地还有不少学者纷纷编辑泰戈尔研究文集，在1961年前后出版。这些论文集对于印度学者继续研究泰戈尔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集中展示了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它们也向世界学术界说明了泰戈尔研究的重要价值。

以上学术举措为契机，印度学者的泰戈尔研究进入第一个繁荣发展期。这一时期即六十到七十年代，印度学者的泰戈尔研究著作空前增加。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著作延续此前的综合研究模式，对泰戈尔的人格、社会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创作和教育理念等等进行全面观察和评价，这以泰戈尔的孙女婿 K. 克里巴拉尼的《泰戈尔传》<sup>②</sup>和纳拉万的《泰戈尔评论》最为典型。<sup>③</sup>由于两书的论述很有深度，先后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sup>④</sup>泰戈尔的儿子 R. 泰戈尔的《在时间的边缘》、<sup>⑤</sup>M.M. 巴塔切吉的《诗人和思想家泰戈尔》<sup>⑥</sup>和以马拉提语写成、再被译为英语的《诗琴和北斗七星：泰戈尔生平》也属于这一类著作。<sup>⑦</sup> P. K. 穆克吉以孟加拉语写成、后被译为英语的《泰戈尔生平》也是这类著作。<sup>⑧</sup>

第二类著作是以泰戈尔的诗歌创作为论述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泰戈尔的诗人本色，抓住了泰戈尔研究的核心所在，纠正了此前泰戈尔研究的某些弊端和盲区。这类著作包括 S. B. 穆克吉的《泰戈尔诗歌论》、<sup>⑨</sup>S. 高士的《泰戈尔的后期诗歌》<sup>⑩</sup>、B. 波斯的《诗人泰戈尔素描》<sup>⑪</sup>等等。因加尔的《泰戈尔评论》除了论述泰戈尔的诗歌外，还涉及到小说和戏剧范畴，该书1985年再版。<sup>⑫</sup>

第三类是论述泰戈尔的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这包括安纳德的《火山：论泰戈尔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sup>⑬</sup>和 P. J. 桥杜里的《泰戈尔论文学和美学》<sup>⑭</sup>等等。关于泰戈尔文学和美学理论的研究，在此前只有学者们零散的论文涉及，以著作形式出现标志着泰戈尔研究的深入。

第四类著作延续以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继续关注泰戈尔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把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继续引入泰戈尔研究中，在世界文学框架内考察泰戈尔的文学贡献。这类著作包括 S. 巴塔查利雅的《泰戈尔与世界》、<sup>⑮</sup>S. K. 查特吉的《世界文学与泰戈尔》、<sup>⑯</sup>《哥德与泰戈尔：东西方对话的回顾》<sup>⑰</sup>和《泰戈尔与浪漫主义思想》<sup>⑱</sup>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S. 森与1960年出版的文学史性质的《孟加拉文学》以四十多页的篇幅专门介绍泰戈尔的文学实绩。<sup>⑲</sup>这显示泰

<sup>①</sup> Santosh Chandra Sen Gupta, ed., *Rabindranath Tagore: Homage from Visva-Bharati*. 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1962. 纪念泰戈尔的类似论文集还有很多，如 Mahendra Kulasrestha, ed., *Tagore Centenary Volume*, Hoshiarpur: Vishveshvaranand V. R. Institute, 1961. K.K. Mehrotra, ed., *Tagore Centenary Souvenir*, Allahabad: University of Allahabad, 1961-1962.

<sup>②</sup> *Rabindranath Tagore: A Biography*, 1<sup>st</sup>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sup>nd</sup> Edition, Calcutta: Visva Bharati, 1980.

<sup>③</sup> Vishwanath S. Naravane, *An Introduction to Rabindranath Tagore*, Delh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7.

<sup>④</sup> K·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漓江出版社，1984年。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年。

<sup>⑤</sup> Rathindranath Tagore, *On the Edges of Time*, 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1<sup>st</sup> Edition, 1958, 2<sup>nd</sup> Edition, 1981.

<sup>⑥</sup> M.M. Bhattacharje, *Rabindranath Tagore: Poet and Thinker*, Allahabad: Kitab Mahal, 1961.

<sup>⑦</sup> G. D. Khanolkar, *The Lute and the Plough: A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rans. by Thomas Gay, Bombay: The Book Centre, 1965.

<sup>⑧</sup> Prabhat Kumar Mukherji, *Life of Tagore*, Trans. by Sisirkumar Ghose, Delhi: India Book Co., 1975.

<sup>⑨</sup> S.B. Mukherji, *The Poetry of Tagore*,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7.

<sup>⑩</sup> Sisirkumar Ghose, *Later Poems of Tagore*,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sup>⑪</sup> Buddhadeva Bose, *Tagore: Portrait of A Poet*,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1962.

<sup>⑫</sup> K.R. Srinivasa Iyengar, *Rabindranath Tago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65.

<sup>⑬</sup> Mulik Raj Anand, *The Volcano: Some Com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Aesthetic Theories and Art Practice*, Baroda: Maharaja Sayaji Rao University, 1967.

<sup>⑭</sup> Prabas Jiban Chaudhary, *Tagore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Calcutta: Ranbidra Bharati, 1965.

<sup>⑮</sup> S. Bhattacharya, *Tagore and the World*, Calcutta: Das Gupta & Co., 1961.

<sup>⑯</sup> S. K. Chatterji, *World Literature and Tagore*, Santiniketan: Visva Bharati, 1971.

<sup>⑰</sup> Alokaranjan Dasgupta, *Goethe and Tagore: A Retrospect of East-West Colloquy*, Delhi Branch: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1973.

<sup>⑱</sup> Baldev Singh, *Tagore and the Romantic Ideology*, Calcutta: Oriental Longmans, 1963.

<sup>⑲</sup> Sukumar Sen, *Bengali Literature*,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71, pp.248-289.

戈尔在孟加拉语文学史的特殊重要性。该书 1971 年再版。

还有一类著作延续了独立以前的泰戈尔研究传统,对泰戈尔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行检视,这包括 R. N. 拉克提亚的《幽默者泰戈尔》、<sup>①</sup>R. 维尔玛的《反对集权主义的先知泰戈尔》<sup>②</sup>和 K. 戈帕尔的《泰戈尔的社会思想》<sup>③</sup>等等。

第二阶段,西方学者的泰戈尔研究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如 S. N. 黑尔的《东西方的亚洲观:泰戈尔及其日本、中国与印度评论家》<sup>④</sup>颇具学术含金量,出版后常常为人引用。M. M. 拉戈编辑的泰戈尔与西方友人罗森斯坦通信集具有很高的文史研究价值。<sup>⑤</sup>

由上所述,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泰戈尔研究在扬弃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开拓,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内容和观察视角,这对下一阶段泰戈尔研究继续走向深入、迎来新的繁荣阶段打下了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印度的泰戈尔研究既承袭此前的研究底蕴,又受到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一阶段的研究是印度泰戈尔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它主要包括下列研究内容。

首先,在对泰戈尔的著作、书信等进行综合整理并予以出版的基础上,对于泰戈尔生平及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等的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 S. K. 达斯编辑出版了三大卷的《泰戈尔英文作品选》。<sup>⑥</sup>这几乎涵括了泰戈尔所有重要的英文诗歌、戏剧、散文等。克里希那·杜特和安德鲁斯·罗宾逊合作主编并出版了内容丰富的《泰戈尔书信选》。<sup>⑦</sup>此书收录了很多尚未发表的泰戈尔与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通信。B. 恰克拉沃迪选编并出版了泰戈尔于 1912-1940 年间与叶芝和庞德等五位西方作家或学者的书信选。<sup>⑧</sup>对于世界各地学者而言,这几种书籍对其系统研究泰戈尔及其与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将发挥重要作用。克里希那·杜特和安德鲁斯·罗宾逊还各自撰写了其他有关泰戈尔的研究著作,并合作出版了系统研究泰戈尔的《杰出智者泰戈尔》。<sup>⑨</sup>M. 查克拉巴蒂的《探寻泰戈尔》、<sup>⑩</sup>V. R. 巴塔查利雅的《泰戈尔的世界家庭观》<sup>11</sup>和 B. 桥杜里等主编的论文集《泰戈尔与今日世界》也是对泰戈尔思想及创作的全面研究。<sup>12</sup>K. K. 黛松出版了《在你奇葩盛开的花园:泰戈尔与维多利亚·奥坎波》,首次纵向梳理了泰戈尔与自己的阿根廷女崇拜者之间的交往史,向学界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sup>13</sup>孟加拉国学者哈克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泰戈尔作品中的民间传统和民族主义》,讨论了泰戈尔的文学创作与孟加拉民间文化传统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关联。<sup>14</sup>

其次,这一阶段对泰戈尔文学创作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如 B. 查克拉沃迪集三十五年研究之功力,出版了四大卷著作《戏剧家泰戈尔研究》。

<sup>①</sup> Ram Niwas Lakhota, *Tagore as a Humorist*, Ahmedabad: Asha Publishing House, 1961.

<sup>②</sup> Rajendra Verma, *Rabindranath Tagore: Prophet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4.

<sup>③</sup> K. Gopal, *Social Thought of Rabindranath Tagore*, Meerut: Anu Prakashan, 1974.

<sup>④</sup>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up>⑤</sup> Mary M. Lago, ed., *Imperfect Encounter: Letters of William Rothenstein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1911-1941*,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up>⑥</sup> Sisir Kumar Das, ed. *The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Vol. 1-3*,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6.

<sup>⑦</sup> Krishna Dutta and Andrew Robinson, eds., *Selected Letter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⑧</sup> Bikash Chakravarty, ed., *Poets to a Poet: Letters to Rabindranath Tagore*, Calcutta: Visva Bharati, 1998.

<sup>⑨</sup> Krishna Dutta and Andrew Robinson,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Myriad-Minded M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sup>⑩</sup> Mohit Chakrabarti, *Rabindranath Tagore: A Quest*,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5.

<sup>11</sup> Vivek Ranjan Bhattacharya, *Tagore's Vision of a Global Family*, Delhi: Enkay Publishers, 1987.

<sup>12</sup> Bhudeb Chaudhuri and K.G. Subramanian, eds.,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Sh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88.

<sup>13</sup> Ketaki Kushari Dyson, *In Your Blossoming Flower Garden: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ctoria Ocampo*,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88.

<sup>14</sup> Abu Saeed Zahurul Haque,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Rabindranath Tagore*, Dacca: Bangla Academy, 1981.

①该书对泰戈尔所有戏剧著作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这在泰戈尔戏剧研究中尚属首次。M.萨拉达的《泰戈尔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维度。②孟加拉国学者 C.霍拉德在印度普拉大学以关于泰戈尔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印度出版了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迦梨陀娑对泰戈尔的影响》，这是泰戈尔研究领域的又一突破。③霍拉德精通梵语和孟加拉语，他从语言和思想两个层面分析了迦梨陀娑对泰戈尔的全面影响。

在对泰戈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研究方面，印度学者继续开掘，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果。例如，B.K.穆克吉出版了《吠檀多与泰戈尔》，从宗教哲学角度深化了泰戈尔研究。④K.K.沙尔玛的《泰戈尔的美学思想》⑤和 R.S.阿格瓦拉的《泰戈尔的美学意识》⑥则集中探讨泰戈尔的美学思想。

第三阶段的泰戈尔研究更有特色之处在于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的广泛应用，使得泰戈尔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新意。这使泰戈尔研究在世界文学的框架内得以进一步深化。例如，A.毛利亚主编的《印度与世界文学》第十一章标题为“泰戈尔与世界文学”，对泰戈尔与克罗齐、T.S.艾略特等西方作家或文论家进行比较研究。⑦ S.K.达斯在个人论文集中，对泰戈尔与西班牙诗人杰姆列兹(Juan Ramon Jimenez)的文学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⑧T.R.沙尔玛主编出版了两部泰戈尔研究论文集《泰戈尔面面观》⑨和《泰戈尔论文集》，其中有很多文章是对泰戈尔与雪莱、庞德等西方诗人的比较研究。⑩有的论文还以梵语诗学味论评价泰戈尔的短篇小说。⑪有的学者如 R. D. 斯勒主编出版了很有新意的著作《世界文学中的泰戈尔形象》，这是迄今为止泰戈尔研究领域最为特色的比较文学著作。⑫它把泰戈尔在前苏联、法国及阿根廷、墨西哥等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反响和泰戈尔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伊朗等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反应进行了系统梳理。作者主要以尼赫鲁大学各个语种的研究者为主。另外几部著作也值得一提，如 S.巴苏的《契诃夫和泰戈尔短篇小说比较研究》、⑬B.N.高士的《俄罗斯与印度：泰戈尔回忆录》⑭和 R.威尔玛的《泰戈尔与艾略特作品中的人与社会》⑮等等。另外，《贾达瓦普尔比较文学学报》(Jadavpu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也不定期刊登比较研究泰戈尔与世界文学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学关系研究，印度学者非常重视，他们虽未出版专著，但论文不少，如谭中和 S.K.达斯等人的论文便是如此。⑯

第三阶段的泰戈尔研究更富特色的地方还在于，一些学者将泰戈尔放在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进行打量，得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结论，这使他们的泰戈尔研究更富新意。例如，哈利西·特里维迪出版了《文学与民族：英国与印度(1800-1990)》，他在书中把泰戈尔放在后殖民语境中进行思考。⑰阿西斯·南

① Bishweshwar Chakraverty, *Tagore the Dramatist: A Critical Study*, Vol.1-4,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② M. Sarada, *Rabindranath Tagore: A Study of Women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8.

③ Chinmoy Howlader, *Influence of Kalidasa on Rabindranath Tagore*, Delhi: Bharatiya Kala Prakashan, 2003.

④ B.C. Mukherji, *Vedanta and Tagore*, Delhi: M.D. Publications, 1994.

⑤ K.K.Sharma, *Rabindranath Tagore's Aesthetics*,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88.

⑥ R.S.Agarwala,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Tagore*, Calcutta, 1996.

⑦ Abhai Maurya, ed., *India and World Literature*, Delhi: 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 1990, pp.543-591.

⑧ Sisir Kumar Das, *Indian Ode to the West Wind: Studies in Literary Encounters*,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2001, pp.143-159.

⑨ T.R. Sharma, ed., *Perspective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Ghaziabad: Vimal Prakashan, 1986.

⑩ T.R. Sharma, ed., *Essay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Ghaziabad: Vimal Prakashan, 1987.

⑪ P.P. Sharma, "Application of the Rasa Theory to Tagore's Short Stories," T.R. Sharma, ed., *Perspective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Ghaziabad: Vimal Prakashan, 1986, pp.80-86.

⑫ Rita D. Sil, ed., *Profil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in World Literature*, Delhi: Khama Publishers, 2002.

⑬ Sankar Basu, *Chekhov and Tago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Short Stories*,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5.

⑭ B.N.Ghosh, *Russia and India: Reminiscences from Tagore*, Delhi: Ess Ess Publications, 1985.

⑮ Rajendra Verma, *Man and Society in Tagore and Eliot*, 1982.

⑯ Sisir Kumar Das, "The Controversial Guest: Tagore in China," Tan Chung, "Tagore's Inspiration in Chinese New Poetry,"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⑰ Richard Allen, & Trivedi, Harish, ed. *Literature & Nation, Britain and India 1800-1990*,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2000.

迪在他的著作中，也把泰戈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放在后殖民框架内进行观察和定位思考。<sup>①</sup>拉纳吉特·古哈在他的著作《位于世界史边缘的历史》中，也把泰戈尔放在后殖民语境中进行考量，以达解构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目的。<sup>②</sup>B.查特吉的《泰戈尔与现代意识》涉及到泰戈尔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意识。<sup>③</sup>A.S.阿尤布先后出版了两部孟加拉语版泰戈尔研究著作即《探寻泰戈尔》和《现代主义和泰戈尔》，后一部还获得了印度文学院奖，两书被译为英语出版。<sup>④</sup>阿尤布探讨了泰戈尔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意识。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也曾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泰戈尔富含现代主义意识的社会文化思想进行论述。<sup>⑤</sup>

## 二、中国的泰戈尔研究简述

与印度学界的泰戈尔研究一样，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为第二阶段，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为第三阶段。下边对此作一简述。

在泰戈尔研究的第一阶段，特别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前后，中国学者对于泰戈尔的译介和研究出现了第一次高潮。早在1913年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年，钱智修就在《东方杂志》十卷四号上发表《台峨儿之人生观》一文，对泰戈尔的思想进行介绍。但对泰戈尔研究没有什么起色，主要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很少，人们难以对其作出评价。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高潮的到来是五四时期，从1920年到1925年。翻译泰戈尔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郑振铎（西谛）。在翻译的同时，郑振铎还身体力行地促进泰戈尔研究。他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在会内发起组织了一个“太戈尔研究会”。这应该是中国研究单个外国作家的第一个学会。文学研究会遂成为当时中国研究泰戈尔译介的重镇。文学研究会的核心刊物《小说月报》成为译介泰戈尔的阵地。1922年到1924年，为了迎接泰戈尔访华，《小说月报》等杂志和《晨报副镌》等报纸集中发表了关于泰戈尔的评论文章，这就成为泰戈尔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也是当时“泰戈尔热”的一种结果。这一期的研究代表作有郑振铎的《太戈尔传》和《太戈尔的艺术观》，张闻天的《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太戈尔的妇女观》和《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王统照的《太戈尔的思想与诗歌的表象》和《太戈尔的人格观》，徐志摩的《泰戈尔来华》等等。王统照和徐志摩等人主要从正面来评价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思想。他们对泰戈尔的评价还带有很多的感性色彩，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例如，徐志摩以诗人的语气说：“东方人能以人格与作为，取得普通崇拜与荣名者，不出在‘国富兵强’的日本，不出在政权独立的中国，而出于亡国民族之印度——这不是应发人猛省的事实吗？”<sup>⑥</sup>同为文学青年的郑振铎则说：“世界上使我们值得去欢迎的恐怕还不到几十人。泰戈尔便是这值得欢迎的最少数的人中最应该使我们带着热烈的心情去欢迎的一个人！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

<sup>①</sup> Ashis Nandy,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1-90.

<sup>②</sup> Ranajit Guha, *History at the Limit of World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6.

<sup>③</sup> Bhabatosh Chatterjee,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Modern Sensibility*,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④</sup> Abu Sayeed Ayyub, *Tagore's Quest*, Calcutta: Papyrus, 1980. Abu Sayeed Ayyub, *Modernism and Tagore*, Trans. by Amitava Ray,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95.

<sup>⑤</sup> 阿玛蒂亚·森：《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刘建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9-93页。

<sup>⑥</sup> 徐志摩：《泰戈尔来华》，《徐志摩文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3年，第167页。

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sup>①</sup>

围绕泰戈尔 1924 年访华及其系列讲演，中国学界对他的评价开始出现严重的分歧。围绕泰戈尔访华，中国知识界有人对他提倡发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主义不赞同，并提出公开批评和质疑。一些政治上倾向进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分子如陈独秀、瞿秋白、雁冰（茅盾）、恽代英、沈泽民等人始终持警戒批判态度。例如，泰戈尔来华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上发文抨击泰戈尔。他认为，泰戈尔不是梁启超之流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而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泰戈尔第一个错误是“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泰戈尔的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sup>②</sup>曾经阅读过泰戈尔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并有所论述的瞿秋白说：“印度已经成了现代的印度，而太戈尔似乎还想返于梵天，难怪分道扬镳——太戈尔已经向后退走了几百年。”因此，瞿秋白称他为“后时的圣人”。<sup>③</sup>雁冰认为，中国只能“相对地欢迎太戈尔”。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更要普告全国的青年，我们所望于太戈尔带来的礼物不是神幻的‘生之实现’，不是那空灵的《吉檀迦利》，却是那悲壮的《跟随光明》！”<sup>④</sup>沈泽民认为：“太戈尔实是一个思想落后的人了。”泰戈尔的思想“实在是中国青年前途的一大障碍。”<sup>⑤</sup>泰戈尔受到批评，是由于他在错误的时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面对限于当时的现实条件及主观因素而对他缺乏足够了解的陈独秀等人而造成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时代的误会。陈独秀等政治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他们对泰戈尔访华在更大程度上是从中国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理解之批判之。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第一次泰戈尔研究热潮实际上是一次“冷潮”。就王统照、徐志摩等人而言，其评价多流于情感抒发，缺乏学术研究品位；就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而言，其评价多受政治气候左右而显得非常偏颇。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条件全面了解泰戈尔的思想及其文学创作，因此，对于泰戈尔的评价是各取所需、有的放矢而已，大多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如闻一多对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加以评论。闻一多认为，泰戈尔诗歌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把握现实，《吉檀迦利》等诗集是祈祷词，没有感情，其艺术水平很平庸。闻一多对泰戈尔的评价大体上反映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印度宗教文化的隔膜。总之，二十年代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只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感性评价，大多还没有上升到理性客观的判断水准。随着泰戈尔访华结束，“泰戈尔热”迅速散去，对于泰戈尔的译介和研究迅速回落至低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中印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学界对于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和评价开始进入新的时期。1961 年，为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经过多年的策划和准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百四十三万字的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包括泰戈尔的诗歌、戏剧和小说代表作若干，占泰戈尔全部作品的七分之一。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学界关于泰戈尔的评论和研究文章只有数十篇。这包括季羨林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光明日报》1961 年 5 月 15 日）、石真为泰戈尔长篇小说《戈拉》写的前言和为其戏剧《摩克多塔拉》写

<sup>①</sup>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89 页。

<sup>②</sup> 陈独秀：《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载《国民日报·觉悟》，1924 年 4 月。

<sup>③</sup> 瞿秋白：《过去的人——太戈尔》，载《中国青年》第 27 期，1924 年 4 月 18 日。

<sup>④</sup> 雁冰：《对于泰戈尔的希望》，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 年 4 月 14 日。

<sup>⑤</sup> 沈泽民：《太戈尔与中国青年》，载《中国青年》第 27 期，1924 年 4 月。



的译后记等等。五十年代，中国文学评论界盛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标准和模式，这在泰戈尔评价和研究中也有所反应。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泰戈尔宗教神秘主义的、有神论的倾向不无避讳，而对他的批判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则予以特别的重视。”<sup>①</sup>

客观来看，这一时期对于泰戈尔作品的译介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很多宗教哲学论文和演讲集均未译为中文，这使研究者面临无米之炊的尴尬。更主要的是，第二阶段里，中印关系在五十年代末的急转直下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刚刚步入正轨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热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整个六十到七十年代，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乏善可陈。这与同一时期印度学界丰富多彩的泰戈尔研究形成鲜明反差。1979年第2期的《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季羨林的论文《泰戈尔与中国》，对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进行历史溯源和理性分析，这标志泰戈尔研究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进入全面复苏阶段。1981年，全国性的“泰戈尔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泰戈尔译介和研究随之进入第三阶段。

八十到九十年代，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介绍仍在持续，但规模最大的译介当属2000年出版的、刘安武等三人合作主编、多人翻译的二十四卷《泰戈尔全集》。这使中国的泰戈尔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80到1999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泰戈尔评论与研究文章大约在一百四十篇左右。若加上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年，这类文章的总数肯定要超过两百篇左右。这些文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是对泰戈尔生平、思想与文学作品的综合研究，代表性成果如季羨林的《泰戈尔的生平、思想与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等。

第二类文章是对泰戈尔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包括金克木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如珍的《浅论泰戈尔的戏剧创作》（原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蒋承勇的《谈〈沉船〉中的泛爱思想》（载《台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刘建的《论〈吉檀迦利〉》（载《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张朝柯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载《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岳生的《说〈戈拉〉》（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徐坤的《泰戈尔诗歌中的原型》（载《南亚研究》1992年第4期）、何乃英的《论泰戈尔的散文诗》（载《南亚研究》1993年第1期）、侯传文的《泰戈尔的儿童文学创作》（载《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刘建的《泰戈尔短篇小说中的抒情风格》（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蒋登科的《论泰戈尔的散文诗》（载《东方丛刊》1994年第1期）、梁潮的《泰戈尔〈吉檀迦利〉国内评论要端蠡测》（载《广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等等。

第三类是对泰戈尔的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进行评价。这包括倪培耕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管见》（载《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孟昭毅的《泰戈尔与比较文学》（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宫静的《泰戈尔和谐的美学观》（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侯传文的《泰戈尔诗学与西方文论》（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侯传文的《论泰戈尔的韵律诗学》（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侯传文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学》（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等等。

第四类是对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评论。这包括宫静的《泰戈尔的哲学

<sup>①</sup> 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4页。此处介绍多参考该书相关内容。

思想：认识论和方法论》（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3期）、宫静的《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渊源及其特点》（载《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刘建的《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载《南亚研究》2001年第1期）和朱明忠的《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载《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第五类是研究泰戈尔的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等。这包括林承节的《1905—1908年的泰戈尔》（载《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宫静的《论泰戈尔的教育思想》（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2期）、尹锡南的《泰戈尔论印度的社会问题》（载《南亚研究》2004年第2期）等等。

第六类属于泰戈尔与西方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范畴，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包括邓阿宁的《泰戈尔与雪莱》（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石海军的《泰戈尔眼中的东方和西方》（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尹锡南的《解读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载《东方丛刊》2002年第2期）、《泰戈尔与奈保尔：诺贝尔文学奖光晕与印度书写》（载《东方丛刊》2005年第1期）、《泰戈尔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和《泰戈尔与维多利亚·奥坎波的跨文化情愫》（载《东方论坛》）2011年第2期、刘建的《泰戈尔与苏联》（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最后一类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所在，也是中国学术界成果最为丰富、学术质量很高的领域，即研究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关系，这也属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范畴。这包括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载《南亚研究》1986年第1期）、徐坤的《泰戈尔与中国文人》（载《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孙宜学、郭洪涛合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载《同济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尹锡南、张力的《泰戈尔1924年访华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载《南亚研究季刊》2001年第4期）和尹锡南的《天竺诗圣、华夏知音：1924年泰戈尔访华》（载《今日印度》2010年第7期，该文英文版载《印度展望》2010年第2期）、秦弓的《泰戈尔热》（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和王汝良的《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载《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王燕的《泰戈尔访华：回顾与辨误》（载《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郁龙余的《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载《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等。可以看出，泰戈尔1924年访华及其复杂反响这一重要事件成为当代学者们争相评述的议题。

从上述挂一漏万的介绍看，《南亚研究》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泰戈尔研究论文，且发表的论文质量大多属于上乘之作。第三阶段的泰戈尔研究论文大致以研究泰戈尔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及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为重点。

第三阶段的泰戈尔研究还出版了很多文学导读性质的著作或学术研究著作，其中，导读性质的有吴文辉的《泰戈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郝岚的《解读泰戈尔诗选》（2001年）、何乃英的《泰戈尔诗选导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北城的《圣地灵音：泰戈尔其人其作》（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侯传文的《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尹锡南的《发现泰戈尔：影响世界的东方诗哲》（台湾原神出版事业机构，2005年）等等；学术研究性质或集研究与资料汇编于一体的有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唐仁虎等著《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年）、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2010年）等等。从这些著作来看，关于泰戈尔

研究的深化还在 2000 年二十四卷《泰戈尔全集》中文版出版以后。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著作以一定的篇幅论及泰戈尔的各个方面，如林承节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涉及泰戈尔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的事迹考证，林承节的《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则考察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友好往来。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年）也涉及到泰戈尔与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关系。黄心川的《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 年）的第九章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大约有三十页的篇幅。石海峻的《20 世纪印度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 年）以近二十页的篇幅专章论述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唐仁虎、刘署雄和姜景奎合编的《印度文学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登载了两篇论述泰戈尔的文章，即唐仁虎的《论〈戈拉〉中的宗教思想》和陈明的《简论〈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义》。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涉及到泰戈尔在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译介与研究述评。这些书对于泰戈尔的论述均有一定的深度，各具特色，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语境中的泰戈尔研究。郁龙余等著《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昆仑出版社，2006 年）的第十一章“中印诗学现代转型”近五十页篇幅专论泰戈尔与王国维的文论比较。其他如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东方研究》和《东方文学研究通讯》等也常常刊登泰戈尔研究的论文。另外，国内编写的很多《外国文学史》或《东方文学史》教材也毫无例外地把泰戈尔作为重点作家进行介绍，如郑克鲁和黄宝生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以及郁龙余和孟昭毅合编的《东方文学史》就是如此。可以说，泰戈尔是中国学者最关注的东方作家之一。

另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很多中国学者选择以泰戈尔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例子有张羽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尹锡南的《泰戈尔的文明观及其在东西方的反响》（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周骅的《论泰戈尔的象征剧》（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曾琼的《试论泰戈尔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内涵》（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李金云的《泰戈尔文学作品中的宗教体验》（英文，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任文惠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事件的误读：以东西文化观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张娟的《泰戈尔与“五四”新诗》（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李丽的《社会符号学观照下的〈吉檀迦利〉中译本比较》（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李文斌的《泰戈尔美学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王坤宇的《国内〈吉檀迦利〉研究的困境及新的研究范式的垦殖》（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杨鑫斌的《泰戈尔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蒙古文、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郝玉芳的《泰戈尔的自然诗、自然观、自然美学研究：兼与华兹华斯比较》（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董燕静的《泰戈尔来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王秋君的《泰戈尔诗歌中的生命美学建构》（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张晓梅的《从多元系统论看泰戈尔英诗汉译》（英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周静的《泰戈尔与现代性》（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宋小娟的《泰戈尔女性思想嬗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曾琼的《重读经典：〈吉檀迦利〉

翻译与接受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李金云的《论泰戈尔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元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年)。刘朝华于2002年在深圳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进行了泰戈尔与王国维的诗学比较。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建、陈明、雷武铃等人早年的硕士论文也与泰戈尔研究有关。总之, 这些论文为丰富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增添了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三阶段, 还出版了一些从印地语或英语翻译为中文的印度学者的泰戈尔研究著作, 这为泰戈尔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资料。这些译著有K·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 倪培耕译, 漓江出版社, 1984年; S.C. 圣笈多:《泰戈尔评传》, 董红钧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梅特丽娜·黛维夫人:《家庭中的泰戈尔》, 季羨林译, 漓江出版社, 1985年; 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 刘文哲、何文安译, 重庆出版社, 1985年, 等等。

这样来看, 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的泰戈尔译介和研究渐入佳境。学者们在泰戈尔研究的各个层面有所开掘和探索, 并积累了很多的研究经验, 发表或出版了很多研究成果, 为世界泰戈尔研究作出了贡献。可以说, 从世界范围来说, 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是除了印度学界以外最为丰富的一派。目前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还在持续发展之中, 我们期待出现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和泰戈尔作品的翻译。接下来对中印两国的泰戈尔研究进行简略比较。

### 三、中印泰戈尔研究的比较

中印两国的泰戈尔研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例如, 两国的泰戈尔评论和研究均从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对于当时睁眼看西方的学者们是一种话语激励。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使其文化话语占据强势地位。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又使欧美人士在反思西方文明的危机根源时把目光投向了当时在西方游学讲演的泰戈尔身上。在这种情况下, 泰戈尔开始在东方和西方同时建构起一种文化英雄或救世主形象。西方对泰戈尔一段时间的认同和崇拜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各国学者对泰戈尔的赞赏和重视, 对其出现或短或长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的泰戈尔研究均可分为三个阶段, 时间划分上基本重合, 即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以及八十年代至今, 每一个时段大致在三十年左右。在第一个时期, 印度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关注重点均是泰戈尔的东西文化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这应该与当时两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第二个时期里, 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特别是1961年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引发的泰戈尔研究热潮给印度持续至今的泰戈尔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中国学者因为各种复杂因素, 与印度相比, 除了出版泰戈尔文集外, 关于泰戈尔研究的成果非常不成比例。当然, 这也与建国以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学者们的眼光更多地投向欧美文学领域。印度文学成为相对冷清许多的研究领域。这与同一时期印度学界丰富多彩的泰戈尔研究形成鲜明反差。在第三个时期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中印两国学者的泰戈尔研究都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中国, 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营造了健康的研究环境; 在印度, 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前期研究基础和印度人民对泰戈尔一如既往的热爱, 使其泰戈尔研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中印两国学者的泰戈尔研究必将继续向前

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中印泰戈尔研究除了在研究时段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外，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考察这些差异对于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不无启迪。

首先，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与印度不同，虽然它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但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断层。如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归国后，中国学界因为很多复杂因素，对其译介研究出现了持续的低潮。直到 1949 年后，部分中国学者因为中印关系友好的背景，才重新开启泰戈尔研究的大门。1961 年的泰戈尔文集出版，是泰戈尔译介和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它使得中国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增添了更丰富的资料。但由于中印交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第二阶段的泰戈尔研究还未及形成规模，就再次陷入低谷。这两次低潮或低谷，势必使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基础显得非常薄弱。八十年代以来的泰戈尔研究由于改革开放的国策，非但没有出现断层或停顿现象，反而由于 2000 年二十四卷《泰戈尔全集》的出版，迅速步入研究的繁荣发展期。

其次，中印两国的泰戈尔研究在研究语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均存在很多差异。就语言而言，中国学者大多利用中文翻译资料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利用英文资料研究，极少数学者如刘安武、董友忱、白开元和刘建等人利用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或印地语资料进行译介或研究，这与印度学者大多能娴熟利用孟加拉语、印地语和英语等语种资料进行泰戈尔研究形成强烈对比。印度学者的英文著述往往能为西方学者及时了解，这增加了印度学者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当然，曾琼等少数学者通过孟加拉语研究泰戈尔诗歌与中国的文化关系是一个可喜的迹象。由于很多中文版泰戈尔作品存在译介中的“文化误读”和“文化失落”现象，对于泰戈尔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必定会遇到程度不一的障碍。这当然会影响研究的质量。泰戈尔作品、特别是泰戈尔的哲学著作、文学理论著述等，需要对印度文化如印度宗教和梵语诗学理论等有非常专门的研究才能译好，这给翻译泰戈尔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就研究内容来看，总体而言，中国学者以研究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居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泰戈尔在中国主要是以诗歌等文学作品而闻名。不过，中国学者对于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美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等也有很多研究成果，只是总体上不及对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的成果丰富罢了。但有的内容如泰戈尔与西方的文学关系、泰戈尔的个人情感世界、泰戈尔与甘地、尼赫鲁的关系、泰戈尔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及泰戈尔的音乐绘画艺术等，还存在研究空白或不理想的研究状态。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中国学者在研究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及泰戈尔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比较方面，占有先天的优势。在这方面，季羨林、刘建、侯传文和刘朝华等学者的泰戈尔研究成果便是明显的例子。鉴于此，中国学者应该加强对泰戈尔与西方文学关系、泰戈尔在印度国内的传播影响和泰戈尔思想的当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在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上发掘新的材料，促进和深化新世纪的泰戈尔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印度学者常常取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and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泰戈尔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深入研究。中国学者也常常有人利用这些方法研究泰戈尔。如侯传文的新著《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对泰戈尔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和对泰戈尔生态文学理念的阐释、曾琼对泰戈尔诗歌在中国语境的影响研究、刘朝华对泰戈尔和王国维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等等。拙著《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考察泰戈尔的东西文明观及其实践，是采取跨学科路径

对泰戈尔进行研究的一种尝试。

就研究成果而言，印度学者以著作形式研究泰戈尔者很多，但中国学者研究泰戈尔的著作相对而言很少。如果把分析阐释泰戈尔文学作品的导读著作以及关于泰戈尔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综合介绍的著作排除在外，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就显得更少了。但中国学者以单篇论文的形式研究泰戈尔者不在少数，很多高质量的论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专著的不足。不过，与印度学者以著作形式研究泰戈尔的文学理论、美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理念等内容相比，中国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研究著作更能显示泰戈尔研究的深入。

另外，还有一个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或差异，在印度，孟加拉语、印地语和马拉提语等各个印度语种的学者都有质量不一、数量不等的泰戈尔研究论文或著作发表或出版，有的著述还被译为英语在印度国内外出版。但在中国学术界，一般而言，关于泰戈尔研究的成果著述基本以中文形式面世，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泰戈尔研究成果罕见。这不利于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更好地研究泰戈尔其人其作。希望这一局面能有所改观。

客观地看，中国的泰戈尔研究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显得相对滞后一些。如何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深化泰戈尔研究，笔者尝试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首先，中国部分学者要彻底抛弃头脑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重视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研究，为泰戈尔研究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印度文学研究者也要主动学习西方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泰戈尔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最主要的是，要掌握印度文化的基础知识。

其次，中国学者应该在语言文化上下功夫。前述研究泰戈尔与阿根廷女崇拜者之间感情纠葛的印度学者 K.K.黛松为了阅读西班牙语文献，便下决心学习维克多利亞·沃坎坡的母语西班牙语，这使她的研究著述具有一手资料的坚实基础。泰戈尔研究对中国学者和很多印度学者而言，都是一门跨语言的研究。有志于此者如想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必须进入孟加拉语的门径探幽览胜。如实在不具备条件者，可以利用学习梵语或印地语等相关语言，取得研究泰戈尔的间接语言优势。因为，梵语是孟加拉语的“母亲”，而印地语和孟加拉语很有“亲和力”。如不具备这些语言学习条件，也可通过阅读英文资料进行研究，再辅以阅读质量上佳的中文版印度文化著述以为不时之需。当然，如中国的孟加拉语教学和研究能有更多起色和文学转向的话，泰戈尔研究者必将受益匪浅。

再次，中国目前的泰戈尔作品翻译虽然已颇具规模，但仍有很多泰戈尔英文书信和已被译为英语的孟加拉语书信未被译为中文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这需要翻译界和泰戈尔研究者的努力。前述的克里希那·杜特和安德鲁斯·罗宾逊合编的《泰戈尔书信选》(Krishna Dutta and Andrews Robinson, eds., *Selected Letter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收录了很多尚未发表的泰戈尔与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通信。B. 恰克拉沃迪选编并出版了泰戈尔于 1912-1940 年间与叶芝和庞德等五位西方作家或学者的书信选 (Bikash Chakravarty, ed., *Poets to a Poet: Letters to Rabindranath Tagore*, Calcutta: Visva Bharati, 1998)。这些都是泰戈尔研究的宝贵资料。书信往来往往能够揭示泰戈尔的思想精华和情感世界，缺少对泰戈尔书信的研究，总是一种无形的缺陷。掌握英文的泰戈尔研究者应当首先重视这一点。

再次，和梵语诗学研究相似，中国学者应该采取走出国门的策略，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泰戈尔研究和梵语诗学研究一样，其重镇均在印度。当然，孟加

拉国的泰戈尔研究也具有相当水平和实力。如果能与印度或孟加拉国学者直面对话，或虚心学习他们的研究经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必将更上层楼。近年来，以世界范围内纪念泰戈尔 150 周年诞辰为契机，部分中印学者互相在对方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显示了文明对话和学术交流的良好趋势。如《深圳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便刊载了谭中的《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桥梁》和阿玛蒂亚·森的《泰戈尔与中国》等两篇论文，而印度外交部主办的英文杂志《印度展望》(Indian Perspective)也刊登了尹锡南的论文 **Tagore's Visit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literary world**。

另外，中国学者要主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以了解世界学术动态。2009 到 2010 年的四次泰戈尔系列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新加坡、中国和印度举行，部分中国学者已经参加了美国和新加坡研讨会。这对我们了解泰戈尔研究的最新发展很有帮助。以后的中国印度文学研讨会，也可以邀请印度学者参加，就泰戈尔研究等相关议题展开学术对话，这将促进两国的泰戈尔研究走向深入。泰戈尔这个名字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印世代友好的象征，相信对于他的深入研究会进一步拉近中印人民的心灵距离。

还有，如果能在适当时机成立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会，使世界范围内早已实际存在的“泰学”（泰戈尔翻译和研究）在中国语境中“师出有名”，必将对未来的泰戈尔研究带来良好的学术效应。中国学界可以考虑创办定期的《泰戈尔研究》杂志，以促进研究的深入开展。西方传来的“莎学”和中国的“红学”能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翩翩共舞，印度首创的“泰学”为何不能和“红学”在华夏大地“龙象共舞”呢？

（作者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